

《世界如此危机》连载（一）

■ 高连奎/文

文明是古代的模式,模式是现代的文明。古往今来,“哀民生之多艰”者数不胜数。以至于马致远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今日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相信市场,又不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望福利社会,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进行发展模式创新,笔者写本书也是想为中国提供一个可行性的选择。

去年秋天,笔者受邀参加美国一家知名媒体访谈节目,主题是谈中国的仇富问题,当时嘉宾有三位,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知名华人经济学教授,另一位是一个旅居泰国的华人,再就是笔者,在节目中,有人认为中国仇富问题的根本在于官员腐败,有人认为是垄断和国企问题,而笔者则指出仇富是世界性问题,只有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但当时主持人并不完全认同笔者的看法,她认为“仇富”在美国并不严重,她举例说,很多美国的富人跟穷人也同样的超市开车购物,他们的汽车也并没有遭到穷人的攻击。在节目中,由于时间关系,笔者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与她进一步讨论,但节目录制完没过多久,美国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事实也就说明了一切。

在这里提这个事情,笔者并不是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分出个好坏,而是要说,现在的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有问题,美国有问题,同样欧洲也有问题,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模式困境”。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这种问题暴露更明显,任何一个经常关注国际时事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而要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人类的历程,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的发展可以归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主义模式,在本书中,笔者将其称为“世界模式 10”,在这种模式下,人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模式最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成为经典,当时的政府被称为“守夜人”政府。在这种模式下,西方国家表面上也拥有了一切:财富、政治智慧和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世界的霸权也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传递到了英国手中,前后历时约 500 年。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表面风光,但其内部矛盾重重,而频繁的经济危机、严重的阶级冲突,以及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宣告了这种模式的失败。

在这种情形下,另一种模式诞生了,这种模式并没有诞生在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是诞生在了另一个正在新崛起的大国德国,确切的说,当时还不存在德国,因为当时的德意志还处在封建社会,全国有几百个骑士国组成,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封建割据导致了国内缺乏统一的市场,严重的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卑斯麦极力的想统一德国,但德国也面临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阻碍了俾斯麦的对外征战,而当时国内兴起的“工厂立法”却吸引了俾斯麦的注意。

工厂立法其实并非起源于德国,而是诞生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英国工人要求政府进行立法,缩短工时,英国资本家当时极其反对缩短工作日的“工厂立法”,并且与工人展开了血腥斗争,直到缩短工作日,在工人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资本家的收益也大大增加。这是因为,在新情况下,一方面资本家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工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得到了改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从而资本家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这种状况马上被德国注意到了,当时德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德国资本家如果要赶上英国资本家,并和这个世界上强大的对手进行竞争,就不能重复英国工厂立法的道路,而是要缩短这个阶段。因此德国的资本家们着急了,他们成立了协会,主动要求把工作日首先从十三个小时缩短到十二个小时。俾斯麦看到“工厂立法”对平息工人斗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后,便亲自推动了这一进程。1883 年,德国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在次年通过,就连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在 1889 年获得批准。

现在柏林市政厅二楼会议堂的一幅 19 世纪的油画就是显示的当时情形,在画中,俾斯麦身穿军服,手里拎着一把德国菜刀主持国务议会,讨论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如果哪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敢对这老年保险法不同意,这位铁血宰相随时都可以将他的脑袋割下来,最后所有人战战兢兢地顺从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意志。

就是这样,由此德国成为了世界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德国工人在世界上最早拥有了保险和退休金。而工人福利的改善,极大的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也一跃从西欧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与英法抗衡的强国。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一直将“工厂立法”当成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并将其称为“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之花”。

德国崛起的经验反过来又触动了英法等国家,他们也纷纷效仿。英国 1905 年制定了

《失业工人法》,1909 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1911 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法国 1894 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 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自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工厂立法”进程。这就揭开了“世界模式 20”的序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高福利的大国苏联开始崛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二战结束后,曾经的霸主英国不甘落后,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建立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而且不仅仅是简单复制德国模式,而是开辟自己的道路。

1941 年,英国成立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社会保障计划。受英国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委托,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负责这项计划的构思和设计,第二年,贝弗里奇爵士提交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这也是影响整个世界社会保障的经典著作,在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被业内人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奠基石。而报告中最著名的福利社会三原则,普享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均等性原则,也成所有文明社会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制度。

此后,福利国家的理念又被推广到北欧。而且它们后来居上,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而当时的北欧,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才进入高峰,他们大多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极其重视劳动者的福利,当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补贴建设住宅,为工人提高各种福利,而就是这些措施让野蠻落后的北欧海盗国们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并一跃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标杆性地区,影响至今。特别是在作为福利国家发源地的英国,在上世纪的大滞涨后,却走向了“去福利化”道路,而且这一削减福利的浪潮也逐步席卷到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其实现在英国的福利制度早已不是贝弗里奇模式了;而北欧国才真正继承了英国模式的“衣钵”,成为贝弗里奇模式的典范。“入海方知天地远,出水才见两腿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些“去福利化”国家的经济几成残枝败叶,而北欧却一枝独秀,散发着明星般的魅力。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最自由的国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人均 GDP 连世界前十名都没有进入,根据发布的 2011 年世界人均 GDP 排名中,美国排第十五位,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北欧国家,而来自多方面的研究也证明北欧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区,可以说北欧高福利国家才真正实现了人权、自由和效率的完美结合。实践证明,北欧是正确的,美国的去福利化是错误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那些已经“去福利化”的国家要想重回高福利也是不容易的,毕竟高福利也有高福利的缺陷,因为高福利必然要求高税收,而高税收又必然推高生存成本,而且现在人类面临的不仅是贫富分化的问题,更是生存成本不断升高的问题。

在书中,笔者虽然对福利社会不吝赞美之词,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社会从世界模式 10 进化到世界模式 20 是进步,倒退没有出路,现在世界面临的问题就是寻找世界模式 30。而笔者提出的方案就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不是对福利社会的替代,而是补充,福利社会解决的是人类的生老病学等大问题,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解决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细微方面,其具体方案笔者在书中再进行详细介绍。

第一章：

关于福利社会的谎言,你知道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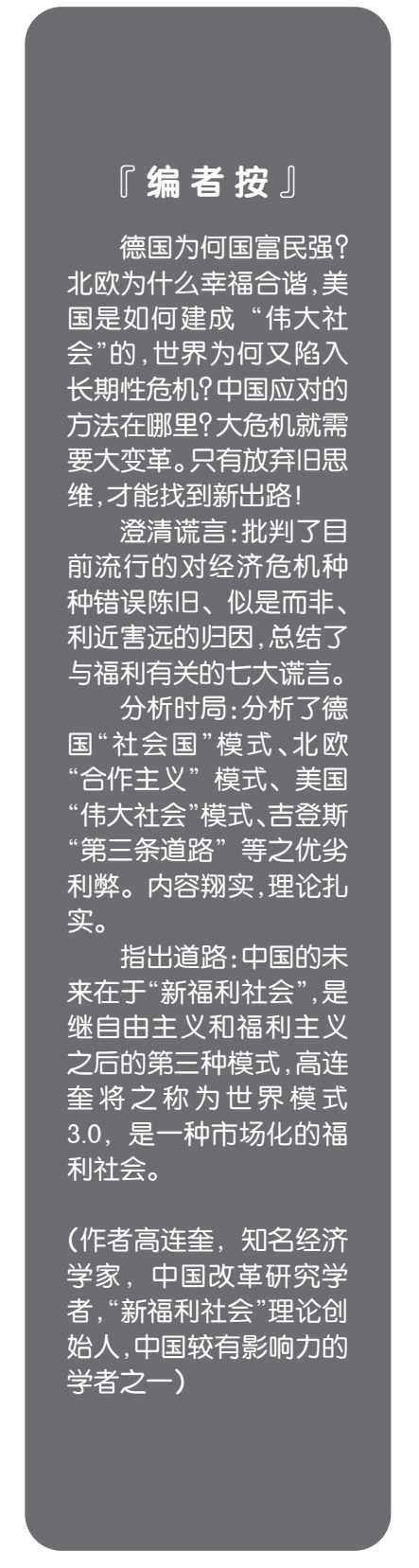
在我们创造新模式之前,我们要看看世界上现有的模式是什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而现在世界上最好的模式,应该算是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

北欧,这一发展较晚、生存环境最恶劣的地区,在福利国家模式下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标杆,他们虽然发展起步很晚(二战之后才真正大发展),但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世界上几乎最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他们虽然是福利社会,国家干预很强,但他们却创造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北欧模式真正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了自由、人权和效率的高度统一,北欧这个诺贝尔奖的发源地,也确实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

福利社会虽然非常优秀,但那些阻碍实行福利社会的人却炮制了很多不实的谎言来玷污福利社会。这些谎言似是而非,大部分都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比如福利社会效率很低、比如福利社会养懒人、比如可以用富人的慈善取代国家福利、比如可以用金融保险取代国家福利等等,其实这些或是不现实,或是在现实中都行不通,或是赤裸裸的谎言,本章主要就是驳斥这些谎言。

美国真的实现“民富”了吗？

美国模式的本质不是民富,而是“两穷一



『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 北欧为什么幸福和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 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 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 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富”,即政府和民众都很穷,只有少数富豪比较富。政府很穷主要表现为政府负债累累,民众之穷则表现为巨大的贫富分化。 现在中国很多学者言必称美国,那美国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探究清楚,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报道是严重失实的,在中国的媒体和知识分子眼里,美国一直是“民富”的典型,而且总是号召中国减轻税费,向美国看齐,而他们的口号就是“民富”。 其实在发生“阿拉伯之春”的时候,美国是乐意看到的,但这些革命并没有止于阿拉伯地区,而且向“民主国家”蔓延,“阿拉伯之春”之后是“印度之夏”,“印度之夏”之后,出现了“美国之秋”,也就是蔓延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占领华尔街”轰轰烈烈,这场运动的最大结果是让世界看到了美国的两极分化。现在大家知道了,美国原来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好,美国模式也出了问题,美国也应该反思自己的模式。 这里我们必须讲清到底什么是美国模式,有句名言说的好,一个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失去了他赖以成功的东西,美国也是如此,美国赖以成功的模式,应该是“罗斯福模式”,而不应该是“里根模式”,更不是“小布什模式”,现在中国学者所鼓吹的美国模式,其实是小布什模式,罗斯福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是用福利和投资拉动经济,罗斯福模式是正确的国家发展模式。 在罗斯福模式下,美国率先走出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从一个边缘国家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大国,并且领导世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并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都是

罗斯福模式的成功,只不过强大后的美国开始穷兵黩武,大搞军事凯恩斯主义,经济这才出现了问题,后面讲约翰逊时代时,我们再详细说这点。

后来美国选择了里根模式,里根模式有两大主张,一是搞企业的更新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成功的;里根模式的另一主张是减税,这导致了后来的“减税—赤字—借债”恶性循环,最终证明这一模式是失败的,美国债务危机的根源就在里根以来的减税上。因此里根模式是“一半对,一半错”,其对的一半就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大供给,而错的一半就是减税。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模式又有了巨大的改变,小布什模式也有几个特色,那就是“用穷人高利贷取代国家福利”,“用信贷消费代替劳动生产率改善”,实践证明小布什模式是彻底失败的,可惜中国学者还没回过神来,还在一味的鼓吹小布什模式。

其实参加“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穷人”,他们很多都有着较高的学历,也曾有着体面的工作,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但是金融海啸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住房,失去了工作,不少人被迫露宿街头,金融海啸虽然加剧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破产,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破产却并非始于金融海啸,而是从里根时期就已经开始。

其实世界本不会自然形成中产阶级社会,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形成“富人占极少数,穷人占大多数”的局面,而中产阶级社会不过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民生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一旦停止,中产阶级社会就会立马消失,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随着里根以来的减税措施逐渐解体的,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阐述。

当代的美国基本上呈现出了“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很穷,民众也很穷,但是少数富有群体却非常富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用涓滴效应来解释他的经济政策。“涓滴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中,不应该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是贫困地区特别优待,而是通过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带动贫困阶层或落后地区发展,这其实与中国的“先富带后富”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里根政府开始为富人大幅减税,同时大幅削减穷人福利,比如美国大幅降低了富有群体的资本利得税,同时基本上停止了针对穷人的社会保障房的建设,并鼓励穷人贷款买房,后者成为次债危机的直接原因。

现在美国上层 1%的人每年拿走将近 1/4 的国民收入,控制了 40%的财富。25 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12%和 33%。塔尖 1%者的收入在过去 10 年增长了 18%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的劳动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 25 年里,下降了 12%。今天美国青年失业率约在 20%左右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为 40%；每 6 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所需就业机会；每 7 个美国人就有 1 个要靠食物券生活。

现在 1/3 的美国人不再相信“美国梦”。他们之所以对“美国梦”失去信心,就是因为他们虽然一生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地工作,在老年时却要面对令人窒息的贫穷生活。

金融危机后美国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数达到 4620 万,这是人口普查局 1959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据报道,现在美国 65 岁以上的老人有四分之三过着独居生活,属于无依无靠的“饥饿人口”。由于经济困难的老人大部分收入用于支付饭费,没有医疗保险,因此很多人有病无法治疗而死亡。而奥巴马总统好不容易通过的医改方案,在共和党的掣肘之下也成了废纸。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早已成为过眼黄花。

大幅度减税,不仅仅是造成了民众的贫困,而且还造成了政府的贫困,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结果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债务迅速上升。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高达 GDP 的 96.5%以上。债务上限在过去十年被上调了 10 次,几成儿戏。现在美国基础设施严重陈旧,美国许多河堤年久失修,抗灾能力低于设计水平。美国的桥梁中,大约 25%有结构问题。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曾经估计,美国光是在高速公路和桥梁上就欠了大约 16 万亿的建设账。美国富甲天下,但是政府和中下层民众却陷入贫困甚至破产,以至于政府连维持基础设施和办教育的钱都拿不出来。

其实与我们的思维定势很不同,我们传统认为高福利必然高负债,国富必然民穷。但现实案例至少可以说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与福利多少没有关系,高福利国家也可以不欠债,低福利国家照样可欠债。另外“国穷”并不一定就是民富,而很可能就是美国这种“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和民众都非常穷,而只是便宜了少数富豪”。

世界发展实践也证明,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去福利化”的国家都出了严重的问题,而北欧、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福利国

家反而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力。

希腊真的是高福利国家吗？

希腊并非高福利国家,而是低福利国家,希腊欠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高福利是超出自己能力举办了一场奥运会。

欧债危机以来,希腊被当成了高福利的典型,但这是真的吗? 也有人说,高福利的北欧确实成功了,那高福利的南欧却失败了,但人云亦云的事情往往禁不住深入的推敲。

南欧从来就不存在什么高福利,所谓希腊是高福利国家都是赤裸裸的谎言,而且也就是这一两年才被媒体广泛炒作的谎言,其实世界主要国家的福利程度在学术界早就有共识,那就是北欧高于西欧,西欧高于南欧,南欧根本就不是高福利国家,而是低福利国家。

欧债危机中,希腊几乎成为了“明星”国家,但是翻看媒体的报道几乎都是一边倒的批判希腊的高福利制度。而希腊的福利水平其实远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低于真正的福利国家——北欧的水平。

媒体并不能全信,特别是西方媒体,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中国入世谈判时,西方也炒作了一阵子“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的论调,而当时的中国人均 GDP 刚刚达到 1000 美元,而要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至少要人均 GDP 两万美元,也就是当时的中国的人均 GDP 仅仅是发达国家最低标准的二十分之一,即使入世十多年后的今日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西方媒体炒作中国是发达国家纯属是政治需要,这也凸显了西方的舆论霸权。希腊遭遇的就是与当时中国相同的情况。

希腊的福利到底有多高呢? 在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仅为 20.6%,不及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在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 GDP 的 34.9%,英国社会福利开支占 GDP 的 25.9%,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占 GDP 的 27.6%,欧盟 27 国平均社保支出总额占 GDP 的 26.9%。北欧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更是约占 GDP 的 1/3,这些都远远超出希腊水平。

可以说,希腊是莫名其妙的“被高福利”了,而在之前的任何经济资料中都没有将希腊当成过高福利国家的记录,民间俗语有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在西方舆论霸权面前,希腊不服不行。

而西方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希腊欠债了,欠债该如何还,必须削减政府开支,而政府开始如何削减,当然是削减民众的福利了,因此英国、美国都炒作希腊是福利国家,其实就是为了让希腊削减福利,而希腊人民当然不愿意,因为希腊本来福利就很低,如果再削减那怎么受得了。

2011 年的希腊面对高达 17.6%的失业率,将近 10 万的失业人口,福利其实少得可怜,仅仅是发放最基本的退休或养老金方面希腊就用掉了其福利开支的 90%,而用在家庭、医疗、失业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资金只占 32%左右。

希腊的失业保险项目只能覆盖极少数的失业人群,失业方面的福利开支也一直很低,且只有长期、不间断的失业者,才能申请失业救济金。通常情况下,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开支与失业率成正比,但希腊的失业保险金多少年来,并没有随失业率而增长。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 GDP 的 0.1%,仅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 1/5,与丹麦、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希腊,家庭仍然是给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庇护的主要单位。

其实希腊的高负债并非因为“高福利”,而是因为举办 2004 年奥运会的亏损所致。希腊是个小国,其人口不过 1100 万,这个数字还不及我国上海市常住人口 2300 万的一半,这样一个小国家,却要承办一场奥运会,其财政负担可想而知。

雅典奥运会最初的预算为 46 亿欧元,这是 2000 至 2004 年希腊财政总收入 200 亿欧元的 1/4,可谓不小。而事后雅典奥运会总开支大约 160 亿美元,几乎是预算的 3 倍,雅典奥运会刚刚结束,《经济学家》杂志就替雅典算了一笔经济账,除去商业赞助、门票销售和其他商业活动获得的收入之外,希腊的纳税人还必须承担 3 亿美元的奥运会组织费用、15 亿美元的安全保卫工作费用、70 亿美元的其他费用。建设和安全费用的大幅提升是亏损的一大因素。

雅典是“9·11 事件”后举办的首届奥运会,史无前例的 8 万安保人员和众多北约舰船出动,希腊人几乎倾其所有用于支付安保费用,平均每个希腊人要为此付出 100 多美元。雅典奥运会在安全费用方面的支出是 2000 年悉尼奥运会的近 6 倍,是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 50 倍。希腊奥运会也是自 1952 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52 年来第一个由小国举办的奥运。其结果就是雅典奥运会是自 1992 年奥运会以来 4 届中亏损最大的。如果亏损在今后 5 年通过增补税足,则每年需要征税约 5.5 亿欧元,相当于希腊 2000 年财政收入的 1/10。这才是希腊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所在。